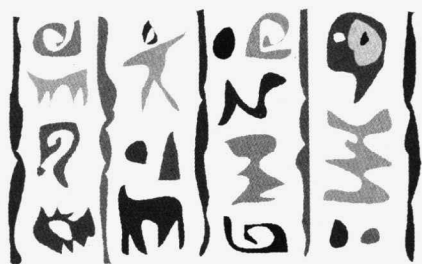


云南社会性别与发展小组 著

参与性发展中的 社会性别足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参与性发展中的 社会性别足迹

云南社会性别与发展小组：（按姓氏笔画排序）

古文凤	苏翠薇	杜娟	李春瑞
张宏文	张洁	陈天亮	金黎燕
赵捷	温益群	童吉渝	薛金玲

闵冬潮 郑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参与性发展中的社会性别足迹/云南社会性别与发展小组
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9

ISBN 7-5004-5224-1

I. 参… II. 云… III. 性社会学—研究 IV. 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7033 号

责任编辑 李 是

责任校对 尹 力

封面设计 三未舂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2

字 数 294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很荣幸能为云南社会性别与发展小组（GAD）所出版的第一本书写序。我与这个小组的许多位成员结识多年，一直对小组成员以及小组的活力和成长既心动又佩服。两年前因参加海外中华妇女学会（CSWS）、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SRAWF）和云南社会性别与发展小组的研究项目而与云南 GAD 小组有进一步的合作，也使我有机会对云南 GAD 小组这一非政府组织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所以当小组要我给这本书写序，我除了感到荣幸，也觉得有不可推卸的义务。

我知道这本书筹划酝酿多年，如今能跟读者见面，是一件可喜可贺的盛事。书中所收录的文章丰富而精彩，以编排顺序看，首先是对小组这些年来实践的概述，然后是多篇小组成员个人的科研成果，接下来是两篇妇女研究学科化的讨论，最后四篇文章对于小组成员所参与的科研和实践项目进行了深刻又生动的回顾与反思。以探讨的主题而言，社会性别是一个贯穿全书的议题，以这个议题为核心，不仅有理论与实践、个案与体制的剖析，也有本土与域外、主流与边缘的辨证。而云南多文化多民族的特殊场域，又与小组成员个人的兴趣和背景交织，呈现给读者多篇把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和分析视角应用在民族研究的成果。

总之，这本书既是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这块土地成长的见证，

也是小组成员个人耕耘的心血结晶。在此我除了有先睹为快的兴奋，还有更上层楼的期盼，希望云南 GAD 小组能苟日新，又日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对社会性别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的推展与升华有更多的建树与贡献。

2004 年 9 月 3 日于多伦多寓所

目 录

序.....	熊秉纯(1)
--------	--------

理 论 篇

我们的足迹

——云南 GAD 小组于发展项目中的实践与反思.....	赵 捷 3
促进大众媒体理解社会性别意识	

——浅析主流媒体的制作机制与政策	童吉渝 26
社会性别意识培训在妇联的实践与思考	李春瑞 35
社会性别的哲学内涵	陈天亮 45

赋权：参与性与社会性别的结合

——社会性别与预防拐卖的社区参与性行动	
研究	童吉渝 64

实 践 篇

名声与生计：丽江东坝子纳西人的社会性别观念

与行为方式	杜 娟 83
-------------	--------

男人带头牵着走 女人做助手

——一个景颇族村庄两性和谐口述材料的	
社会性别透视	金黎燕 114

女人的房子,男人的家

——拉祜族“轮歇地”变迁中的社会性别分析 苏翠薇 159

男不和女织麻布 女不和男葬死人

——苗族麻纺织文化中的社会性别关系透视 古文凤 205

雾村社会性别调查报告 薛金玲 241

一个壮族村落的社会性别状况分析

——以广西大化县共和乡乐一屯为例 张宏文 274

总 结 篇

关于女性研究学科化的猜想和交流 郑 凡 287

在不可能中创造一种可能

——对郑凡关于妇女研究学科化座谈稿的

回应 闵冬潮 308

贴近真实的过程 赵 捷 320

社区·生计·性别

——社会性别与自然资源管理兴趣小组的

发展足迹 苏翠薇 336

摸着石头过河

——“少数民族社会性别制度”口述访谈的实践

与反思 杜 娟 金黎燕 古文凤 苏翠薇 347

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

——社会性别与人口流动小组

..... 童吉渝 张 洁 赵 捷 张宏文 362

后记 温益群 382

理 论 篇

第一章 绪论

2

赵 捷 /

我们的足迹

——云南 GAD 小组于发展项目中的实践与反思

云南 GAD（社会性别与发展）小组成立于 1998 年，隶属于云南参与性发展协会（正式注册的 NGO）。现有组员 24 人。组员中又有五个兴趣小组：培训小组、自然资源管理小组、人口流动研究小组、社会性别制度研究小组、农业科技推广小组。无论哪个兴趣组，其行动或研究均遵循这样的准则：在理念上坚持参与性与社会性别平等；在方法上结合 PRA 与社会性别分析。

本文拟以各兴趣组参与的项目活动为线索，介绍近年来云南 GAD 小组于发展领域的活动及相关的理论反思，并基于女性主义和参与性这两个基本原则之上进行阐述。本文部分内容是与几个兴趣小组的召集人和成员交流而产生的，特别是其中那些闪光点。她们是：杜娟、苏翠薇、金黎燕、李春瑞、姜文、童吉渝和孙大江等，特此说明并致感谢。另外，由于个人时间和交流面的局限，以下所讨论的 GAD 小组的实践和反思，只可能反映某些侧面，并带有一定主观性，且难免挂一漏万。见谅。

一 逻辑基础：关于反思的思考

为什么反思，我认为至少有这样的考虑：

其一，在中国的发展领域特别是社会性别与发展，将女性主义理念作为行动指南且较为执着地进行实践者，多是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妇女学者。或许是出于学者的使命感和职业习惯，她/他们总想于实践中寻求某些理论上的提升。这不仅只是为了纯粹的研究，而是想通过这些自己所参与的干预行动，带来一些实际的变化，从而能够更广泛地影响社会，避免女性主义学者常面临的那种“孤芳自赏”的尴尬。或许是想表明：这些于发展领域中做女权主义研究与实践的学者，并非完全受资助项目的支配而忽略了学术上的探讨，而正是通过项目实践，将女性主义理论的相关假设变为局部的现实存在。换言之，在向主流社会和学术殿堂挺进的过程中，应当有从事社会性别与发展的学者和实践者的影响。这种影响的重要性，可能在将来更为显著，特别是在以本土化和全球化为主题的二十一世纪。

其二，社会性别理论在不长的时期内迅速闯入中国（这与中国国门开放引来的各种妇女发展项目不无关系），因而也带来一些潜在的问题。比如说，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对现实状态梳理的不足。理论准备的不足包括对国外理论学习的欠缺（外国语言是个相关障碍）和国内相关理论构建得不太完善。由此又引出另外的问题，即已有的这些理论，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多元文化和瞬息万变的世界的诠释，在很多时候无法令人信服，特别在云南。面对从社会性别视角观察到的种种新发现，我们总想在特定范畴内将它们串在一起，找到一些相互关系，对原先那种无社会性别敏感的社会有另外一种较全面的解读。但是，我们很难找到适宜的理论框架。更为难堪的是，一不小心又会滑进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框架之中，进而有可能复制现存的两性不平等关系，或者说制造出另外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众所周知，对任何理论的学习和建树，都不可能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基于此，实践者的理论反思尤

其重要。因为，它有可能提出新的挑战。这样的挑战无论是对外或是国内的理论研究，也包括行动实践，都将是有益的。

其三，云南 GAD 小组于项目活动中的实践，常常是同时基于几种原则，如参与性（包括民主、透明、公开、公正等）、社会性别平等以及可持续发展；同时基于几个层面，如调查研究、项目活动的设计或规划、管理和监测，以及过程中的决策和评估等；基于几个范畴，如资源、健康、教育，社区经济、文化、组织的发展和当地人能力增强等等。可能正是由于这样的综合性和多样性，使得原先仅只谈社会性别，或仅讨论参与性，或仅仅基于单一层面和单一范畴而被确认的相关问题，会变得十分的不确定。比如说，面对有关女人或男人的问题时，究竟是“社会性别问题”，还是“贫困问题”，还是“政策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如果都是，那么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又是怎样的？确认问题在运作项目的每个阶段上都十分重要，这涉及预期目标能否实现的问题。尽管人们会说“实践出真知”，但之后留给实施项目当地人的可能会是什么？我们面对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我们的责任和作用以及将会有的影响是什么？这些问题无论在行动之前、之中、之后，都有必要认真的思考和反思。

以下将以社会性别培训、社会性别与林业、人口流动与社会性别、社会性别制度研究和农业技术推广与社会性别等几方面为例，阐述我们做了些什么，是怎样做的，以及同仁们和我是怎样想的。

二 KAS: 社会性别培训的基点

国内外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云南和中国其他老、少、边、穷地区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干预活动。目的在

于切实推动妇女人群的发展，扩大包括妇女在内的边缘群体的受益面。培训是其中常用的手法之一。

近两年来培训小组有过大量的实践，据孙大江（培训小组召集人）提供的信息和我的回忆，从数量上看有：与香港乐施会合作了近10次培训，与SCF（英国儿童救助会）合作的3次培训，与其他组织如ICCIC（工合国际）、温洛克以及当地NGOs合作开展的培训不少于5次。从类别来看有：社会性别意识提升、社会性别与发展、社会性别与健康、社会性别与林业、妇女领导能力建设、机构内的社会性别培训、参与性概念和工具、项目设计、参与性监测与评估，以及参与性组织诊断等。除培训外，还开展相关的资料检索工作，正在做的有社会性别与林业、妇女领导能力建设、社会性别与传媒、社会性别与农村社区组织，以及社会性别主流化等专题。检索中，除关注有些什么范畴和内容的教材外，还关注可借鉴的培训方法和培训案例等。

大江认为：“近年来培训小组于实践中培养了4—5个社会性别培训的专家，锻炼了云南GAD小组成员的培训能力，扩大了我们在该领域的知名度。通过培训，使小组成员加深了对G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理解”。就经验而言，我们“在GAD、社会性别倡导两方面的培训方案设计、培训过程的协助、培训过程的监测与评估上积累了经验。在如何把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发展项目方面有了一些经验。不足之处是，未建立（完善）较有经验者带‘新人’的机制，对已有的培训总结不够”。

KAS可视为您提供培训的三个基点，即K—知识、A—态度、S—技能。或者说：传播知识，影响态度转变，传授行动的技能，三道程序。事实上，知识、态度和技能是三个相辅相成的东西。一般情况下，这三方面的提高需要有个较长的积累阶段。但在项目培训中，则要求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相关知识、态度和技

能的领会、建立和交流程序并达到预期的效果或目的。应当说，这对协助者或是培训者来说，都不是简单的事。除大江提到的培训技巧外，可能需要检讨的还有：

参与者（或被培训者）在投身项目之前，很少有人学习或研究过 GAD。部分人在此之前可能参加过相关培训，但多是短期的，而受到的传统社会性别铸造，却是十几年以上。常言道，态度的转变是最关键的。那么，她/他们于此有什么样的改变？产生变革的要素会是什么？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这些要素起作用？社会性别平等及相关理念，在个人（这包括参与者和协助者）的态度和行为上，在家庭的关系当中，在开展社区活动或工作上，究竟意味着什么？抑或只是在做项目时才被理解为有意义？而在别的时候或其他层面上意义不大？我们（杜娟、金黎燕、李春瑞、童吉渝等和笔者）在讨论影响参与者态度转变时有这样的感悟：大家总以为相关知识和技能才是重要的，态度转变不转变不重要；或者说，“不能强加于人”。但这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我们是在为某项目做 GAD 培训，但最终只会有 WID 或 WAD 的效果。特别是一些综合性项目，要做到以人为本并不那么容易，即仍然是将“妇女”纳入发展的框框。因为项目的有效性对实际操作者或是资助者来说总是第一位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鲜明的，即尽可能地影响其态度转变，不过不是强加，而是真诚的交流，包括个人、家庭和社区生活几个层面的交流。用春瑞的话说：“要影响别人的态度转变，自己的态度要先转变。在对社会性别平等和参与性精神上，要先让自己感动，才能去感染别人和影响社会。”我理解，春瑞说的，不仅只是个体的社会性别意识有所提升即万事大吉，而需要一方面自我革命；一方面是对主流意识的全方位挑战；还有一方面是产生相关的战略思考或行动对策。而且，这不仅只是对协助者而言，

而是协助者与参与者于培训当中相互碰撞、相互认同、共同整合或建构的全过程。

说到这里，又涉及知识和技能。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是，就前述几类培训看，已有培训教材中的知识内容、相关方法或技能多数是“舶来品”，即它们有待完善和须面对中国现实的挑战。尽管结合实际被强调，但由于思维方式和翻译以及其他背景的差异，协助者和参与者面对这些新东西，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文化障碍，会有不同的理解。就协助者一方来说，还不能是“我懂了或理解了”就行了，还要考虑到参与者“他/她们会怎么想，怎么理解”。如果对此不在乎，就可能出现另外的负面影响，即那些原本就有待深入探讨的概念和方法，会被大而化之地和机械性地带过，以致影响培训效果。值得强调的还有：即对知识和技能的界定不能只是单方的，就是说，在培训当中对参与者已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肯定与挖掘，对他/她们及其参与的项目和生活社区的认识或解读。用杜娟的话说：“这是一种权力关系”。培训的协助者与研讨会的协助者不同，相比之下，前者具有更大的话语权，有评判知识的权利。其权力的运作绝对不是小事，它会影响参与对平等和参与内涵的理解；它也可以测试出协助者的真实立场，以及相关态度、知识和技能；它还会关系到新的本土化的知识、技能的产生和被承认，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再有，是对培训效果的评估。这方面的工作多是在培训结束时的现场评估。随后于实际运用当中效果如何的评估，则很少有人认真做过。我们认为，通过一些跟踪评估，讨论有用的知识和方法并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这无论是对协助者或是正在实施曾经接受过培训目前活动的参与者，都将是十分有益的 and 负责任的。

三 森林与男人和女人：谁是项目的主体

由于云南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保护，是云南省发展项目中的重头。这方面有国外的投资，也有大量国内的投资（这与专门的妇女发展项目有所不同），如“退耕还林还草”项目等。在这方面，GAD小组成员或参与项目设计、评估，或提供相关培训，或尝试着自己运作相关的实验性项目。具体地说有：怒江地区的人畜引水工程项目、天然林保护工程的调查研究、薪柴节约能源的需求评估、澜沧江中下游山地民族用地习俗和土地决策动因分析、社会性别与林业培训教材的翻译和改编等等。

据苏翠薇（自然资源管理小组召集人）介绍：“提到自然资源，人们马上想到的是森林、土地、水、空气等自然环境，很难将其与人的发展，特别是不同的女人和男人的发展联系起来。就是说，一般的人都认为，既然是说自然资源的管理，那肯定是资源和环境在首位，人是第二位的。”尽管有人会说，这是互动的，但终极目标还是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不一定会是人的发展。“所以说，在该领域要做到以人为本的发展，很不容易，要真正考虑妇女的发展，那就更不容易了。我们是GAD小组的成员，在这个领域，只要有参与机会，都努力地倡导两性平等，强调关注社会性别问题。但面临的问题是很多的。比如据姜文的介绍，他在怒江的项目强调了社会性别平等。项目点在村级层面成立人畜水资源管理委员会时，他们就要求管委会成员中妇女占到40%—60%。但结果是，进入管委会的妇女总是不爱发言。因而，在决策时她们的意见始终进不去。姜认为这还是传统观念的问题。宋媛也说，在她所参与的“天保工程”项目的信贷活动里，强调妇女必须与男子有平等的机会借贷，有平等的责任。在

借贷机会的分配上，既考虑男性户主，也考虑家庭中的女性成员或户主。但是，实验下来，表面看对社区的震动很大，但实际的效果却没有预期的那么好。”

就笔者个人的理解，在该领域推动社会性别与发展出现滞缓的原因很多。除上述同仁们的分析外，或许还有其他相关因素。正如同仁们所说，“在中国，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都是国家的，如何管理和利用是以国家利益为主的”。这样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规定了女性人群的参与或参与形式。由此可以感觉出，在林业领域中国家与妇女之间的关系及其建构。就是说，她们也包括男性的发展，在很多时候“只能”以林业的发展或其他自然资源保护为前提的。不过，即使如此，事实上还是存在着一个利益整合问题，因为国家利益与民众的利益是紧密关联的。但现实的障碍是，基于原有的仅仅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林业管理制度或体系，很难完成整合民众利益这一过程；再要整合农妇的利益，那就更加困难了。如同电脑软件，由于其结构中没有这样的编程或设置，这套体系就不可能感应现实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有时候不是妇女“不发声”，而是已有的这套管理程序不会识别农妇的声音甚至排斥它们。只有主流社会的声音被识别和被制造成政策，并告诉农妇们，应当做的是什么，不应当做的又是什么。最多只是，在此基础上有时与农妇讨论，征求她们的意见（算是一种参与）。即使提问方式仍然是开放性的，但由于所需信息的范围已被限制，事实上，只可能讨论“封闭性”的问题了。农妇们能选择和决策的空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姜文和其他同仁颇有感慨：“项目提出‘要求妇女参与’，要‘考虑社会性别与发展’，但当地人常常是一种被动的接受，项目一过，一切就都过了，常有流于形式的现象。”

这令笔者想起与 GAD 小组其他成员一起正在做的《社会性